

“清华人”是我最骄傲的名字

● 闫勇(自仪01班)



1980年我从内蒙古丰镇一中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考上清华的丰镇人。想当年考入清华纯属偶然。那时的高考模式是先报志愿后考试。当我把填好的志愿表交到学校后，我的数学老师王敦全代表教研室找我谈话，说我填报的志愿偏低，鼓励我将清华作为重点大学的第一志愿。起初我犹豫不定，觉得清华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父母作为小学教师在“文革”期间曾因家庭出身不好而遭受多次迫害，因此他们担心我的家庭背景会影响到清华的录取，甚至会被取消参加高考的资格。

况且“文革”初期我的大哥闫俊在丰镇一中初中升高中统考时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只因家庭出身问题而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尽管文革早已结束，却给我父母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后来王敦全老师又耐心地向我讲解了报考清华的理由，并希望我把学校的建议转达给我的父母。经过一番斟酌后，最终我重新填写了一张志愿表，报考了清华。当我拿到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那时我还在马桥街小学粉笔厂打工，很多人不禁惊讶：一个穿着破衣烂衫、个头不高、满脸粉笔灰的小男孩居然会考上清华！

进入清华后我始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清华的五年，正是我汲取科学技术知识和锻炼工程实践技能的五年。由于成绩优异，1985年本科毕业前夕，我获得了首届保送研究生的资格。三年的硕士生活转眼即逝，但是硕士研究课题却开启了我对科学研究的初步认识，激发了我对科研工作的兴趣，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我的专业技能。1988年硕士毕业后我被留在自动化系检测教研室任教。当年留校的很多青年教工都忙于考托福，准备出国，但我根本没有要出国的打算，只想在清华好好干一番。当时我是又教课，又当班主任，兼年级主任，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干劲十足，还被评上了先进工作者。记得是在1989年春，教研室主任王家祯教授找到我，说英国一所大学在招聘研究助理，英国本土没有合适人选，因此招聘广告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几个国家。王家祯教授认为这是个可能出国深造的机会，希望我代表清华参加应聘。当时的系主任王森教授也给了我很大鼓励。接下来便是申请、推荐和面试。据悉当时国内其他高校也派出了应聘者。两三个月后，当我得知获得这个职位时，还真有点喜出望外。1989年10月我飞赴英国，进入位于英格兰东北部

的提塞德 (Teesside) 大学, 师从著名的颗粒流量测量专家库塔德 (Coulthard) 教授和核物理学家布恩 (Byrne) 博士, 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助理工作, 兼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基于静电与核辐射传感器的颗粒流量测量。到英不久, 我发现提塞德大学地理位置偏僻, 尽管在颗粒流量研究方面很著名, 但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远不如清华, 曾一度后悔不该出国。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决定既来之则安之。开始的三个月基本上是帮导师打杂, 算是热热身, 开阔眼界。记得当初我用很短的时间, 把一台气液混合流实验装置上的仪表和装置通过接口与计算机相接, 实现了数据采集和实验操作自动化, 两位导师对此赞不绝口。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 我专注于博士课题。从数学建模、计算机仿真到制作样机和大量的试验测试, 可谓是起早贪黑, 加班加点, 并终于在第三年底完成并递交了博士论文。我博士期间研制出的颗粒流量测量系统, 在苏格兰电力公司燃煤发电厂成功地进行了试运行, 并引起该公司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为此, 苏格兰电力公司为我提供了两年博士后工作的资助, 以便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自1992年10月开始做博士后不久, 系里招聘一名教应用物理的讲师, 两位导师都鼓励我申请。我当时并不是很积极, 没曾想过要在英国当教师, 但最后还是决定去试试。后来得知当时应聘该职位的有二十多人, 大多数都有博士学位。经过初选, 我进入了最后面试, 也是六位候选人中唯一的外国人。面试分两个部分, 首先由候选人做一个学术报告, 然后是“多对一”的提问。我清楚地记得报告部分是我当初面试的薄弱环节, 因为英文毕竟不是母语。庆幸的是在我读博士期间曾帮导师带过一些课, 也在大小各种场合做过多次学术报告。这对提高自己用英文授课的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天晚上系主任通知我得到了那个职位。

1993年9月, 我正式成为提塞德大学的讲师。现在回想起来, 这也正是我学术生涯的关键一步。最初的两年, 教学和科研都还算得心应手, 后来逐步发现科研工作很难开拓。原因之一是和前导师在一起工作, 总是放不开手脚; 另外提塞德大学地理位置偏僻, 不利于开展合作研究和获取科研经费; 同时觉得在一所大学工作太久会缺乏新鲜感和挑战性。因此, 我便逐渐产生了离开此校、独闯天下的

愿望。

1996年年初, 我偶然发现格林威治大学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的招聘广告, 便决定一试。我在读博士期间曾在该校做过两个星期的实验, 因而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我国第一批留英学子, 包括著名的教育、翻译名家严复和当年北洋海军的著名将领林泰曾、林永升等, 都曾在那里学习过。经历一番申请、推荐和面试, 我于1996年9月被聘为格林威治大学工程学院的高级讲师。该校位于英格兰东南部, 是英国经济和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进入该校后, 教学更对路了, 先后讲授模拟电子、微机接口、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建模、计算机仿真和科研方法论等本科和硕士课程。除了教学, 我在科研方面也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借助于良好的科研政策和环境, 加上勤奋耕耘,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到五年的时间, 我不但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实验设备, 而且成功地从英国政府机构、各个基金会、欧共体和工业界等得到二十多项科研课题, 研究经费超过二百多万英镑。更值得一提的是, 我向英国贸工部及其相关机构总共申报了八个研究课题, 取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率。研究领域也从单一的颗粒流量测量扩展到颗粒粒度在线测量、工业炉火焰成像与测量、火力发电中燃料在线跟踪、柴油发动机油雾喷吹特征化、无铅激光焊接在线监测、粒状食品质量检验和真伪鉴定等。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 我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我深知一流的科研需要一流的人才, 因此十分注重物色出类拔萃、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 以及基础扎实、有培养前途的博士生。一个以科研组为技术中心, 以多个工业伙伴为服务对象的合作网络逐步形成。以此网络为基础, 我于1998年8月创建了格林威治先进仪表及控制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我们研制的新型静电式颗粒流量测量仪和数字式火焰成像监测系统成功地投入工业使用, 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得到用户的广泛认可和赞赏。我们在英国学术界和工业界逐步赢得了自己的声誉, 也与许多欧洲国家的同行建立了多种合作关系。与此同时, 我们还与国内同行, 包括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计量学院、广东工业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保持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此外, 我的科研组每年在主要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十多篇学术论文, 并被许多行业的学者和技术人员引

用。我先后成为英国测控协会和物理协会的会士、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协会的高级会员，并应邀在多个学术机构兼职，担任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和特约编辑等。由于科研成果突出，我于1998年9月提升为Reader。三年后升为教授，成为格林威治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从讲师到教授，我仅用了八年时间，这在英国大学里并不常见。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好奇地问我有什么窍门，这么快就“爬完了学术梯子”，我回答这很简单：清华的功夫加上严肃的敬业态度。清华堪称中国的剑桥，在那里苦练八年，功夫自然非同一般。另外我趁别人休闲的时候多登了几步，因此比别人快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常应邀在国际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报告之后，常有人问我从哪来，毕业于哪所大学。我总是自豪地说我毕业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03年我很荣幸地获得欧洲最大的工程协会——英国工程技术协会(IET)成就奖章。我也由此成为获得这一殊荣的首位华人。发奖大会后，很多人向我握手祝贺。那时候我知道我代表的不光是中国人，而且也是“清华人”。

自2002年以来，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英国大学教育和科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像格林威治这样的新大学（即1992年以后从原来的Polytechnic改革成立的大学）都逐渐出现了科研资源紧缺和支持力度弱化的现象。2004年6月我带领整个科研团队连同所有科研经费和仪器设备，从格林威治大学迁移至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并担任测控和嵌入式系统研究中心主任。自2008年8月起，我被任命为肯特大学工程学院的科研主管。肯特大学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历史名城坎特伯雷(Canterbury)，地处英格兰东南部，十分靠近英吉利海峡，这为同欧洲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肯特大学本身雄厚的研究实力，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因研究贡献突出，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获得2006年IET工程技术创新奖和2011年英国测控协会亚历克·霍夫-格拉斯比奖。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外电视节目、技术期刊及网络上均有报道。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有过报道。2005年4月我被聘为浙江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光彪特聘教授。2006年9月我成功入围，成为天津大学长江

学者讲座教授，也是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领域中首位长江学者。因在煤粉流量测量和火焰图像处理等领域的杰出贡献，我很荣幸地当选为2011年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员(IEEE Fellow)，是英国自动检测和仪表领域中的首位IEEE Fellow，也是目前国内自动检测和仪表领域中唯一的IEEE Fellow。2011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成为华北电力大学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的兼职教授。2012年被IEEE仪表和检测学会选为Distinguished Lecturer。截至2014年年底我已发表30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被SCI收录论文120多篇），h-index 30，论文被引用3000多次。已成功指导了20多名博士生毕业和12名博士后出站，其中三位分别被聘为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and 上海理工大学的教授、博导。

回顾自己从清华毕业以来所走过的路，我觉得每一步都很幸运，同时也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这里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迷茫，更多的是一个个不眠之夜。在国外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我深深感受到教书育人和国外创业的艰辛。当年从丰镇一中报考清华是最关键的一步，它使我跨入了中国最高学府的门槛，那里聚集着一批学术水平一流、教学技能精湛、思想品德高尚的教师。他们的言传身教和为人师表，深深地感染了我。八年的清华教育为我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使我学到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此，我深情地感谢母校清华的培养。离开清华已三十年了，但清华园的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还记得春天主楼前那悄然绽放的玉兰花，夏天傍晚那连绵起伏的蝉鸣声，秋天二校门旁那成排耸立的银杏树，冬天清华校河上精彩纷呈的溜冰赛。冬去春来，那时的我们可以因考前复习无空座位而直奔林业大学的自习室，可以因手头不宽裕而用粮票与五道口的商贩讨价还价换新衣，也可以因周末食堂的交谊舞会女伴稀少而赶往北大碰运气……那时的我们充满了理想与抱负，现在的我们仍然保持着那份热情，因为我们是“清华人”。

今后的路还很长，无论我走到哪里，清华精神永远激励着我，“清华人”是我最骄傲的名字。⁸⁰

（原载《清华人》2005年第1期，
2015年2月7日修订）